

譯著

工業化與福利：亞洲四小虎的案例

孫健忠譯

摘要

現有福利與工業化之間所建立的理論係基於西方國家歷史的經驗，迄今尚未有嘗試以第三世界新興工業國家為對象來評估這些理論的實證效度。檢視香港、韓國、新加坡與臺灣（所謂四小虎）的工業發展與社會服務，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社會政策的發展並不能歸因於工業化環境之下政治精英分子為了因應工業改變的需要而產生的結果。相反地，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社會政策在性質上是漸進的，同時是許多不同事件影響之下的產物，而這些並不是現有已建立的理論所能解釋的。

依據東方文化民俗的比喻，老虎所代表的屬性是勇敢、威猛與膽識。在最近數年，這些比喻被用來描述一些戰後經濟快速擴張的遠東國家。日本——其中的一隻大老虎——不僅控制了該區域，同時也成為世界的經濟強權。除此之外，四隻小老虎——香港、韓國、新加坡與臺灣——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也抬頭邁進。由於它們在經濟上所展現的實力，已使得原有工業國家在貿易競爭上趨於弱勢，並深感憂懼。

四隻小老虎的案例提供社會科學家一個難得的機會以直接觀察工業轉型的過程，同時測試工業社會發展過程中已建立的假設。由於這些理論假設通常是根據西方工業發展的歷史經驗，因此就社會科學的探究而言，這些亞洲國家快速而明顯的工業化過程具有相當重要的實證意義。

雖然經濟學家已經相當有效的利用亞洲新興工業國家所提供的機會來測試

政治經濟與經濟發展的理論，但是其他領域內的社會科學家卻少有以這些國家的經驗來尋求理論上的發現。事實上，社會學、歷史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假設均可經由此類研究而增進。社會政策研究也可經由詳細檢視這四隻小虎的經驗而獲益。藉由研究其他正在快速工業化社會所興起的福利制度，可以對根據西方少數工業國家經驗所發展的福利理論予以驗證及修正。社會政策發展的理論特別適合以比較的方式來處理。將這些既有理論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情況相對照，本文不僅嘗試檢視這些理論的正確性，同時認為需要有更寬廣的比較探究，以超越傳統西方社會政策研究僅著重在歐洲及北美國家福利現象的情形。

一、福利與工業化：理論與假設

政府福利服務的興起與擴大乃是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扮演整合功能的假設是許多社會政策發展解釋的重心。此假設與福利功能學派理論（functionalist theory of welfare）相關連，它強調工業轉型時社會經濟改變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會問題。這個理論認為這些改變及問題形成引進現代社會福利措施的政治壓力，同時不同的工業社會在福利提供上會漸趨相同而形成聚合效果（Converging effect）。雖然這個理論並未廣泛的被接受，但是其他社會政策發展實證與理論的解釋也認為工業化是現代福利制度產生的最重要因素。一些統計因素分析的研究即指出，工業發展是福利成果最主要的相關因素。雖然福利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對於工業化概念的引用並不明確，但是它們也是

在工業社會存在的前提下作預測。這些理論認為工業化前社會的轉型形成階級衝突，而促使無產階級需求與國家意圖控制的萌生，因此導致現代社會福利方案的建立。這些方案及較廣的福利主義意識形態，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此方式的特點不僅是其剝削的性質，同時也表現在工業文化及組織層次方面）得以形成。最近關於社會政策發展研究的創見如會社主義（Corporatism）也是關切到社會開始工業化時所發生結構的分析。在它的解釋中，社會政策被認為是政府有目的行動的結果，其目的在維持一個整合體的結構。雖然社會政治管理的模式在世界上不同地區暨不同特性的國家正逐漸興起，但是會社主義在工業及後工業社會卻較制度化，在這些社會代表勞工及資本家的功能部門已適當的分化及發展。

雖然這些不同的解釋彼此是競爭的（每一種解釋僅提出不同程度的真實性），但是它們卻有相同的特性。所有的重點都是強調工業化的角色創造了促進現代政府福利制度興起的條件。所有解釋也都聲稱社會福利方案的興起是賴政治精英分子爲了應付工業化的情況而以建立或利用這些方案來達成一些目標。除了因素分析的研究沒有對因果關係作進一步解釋外，其他理論均對此種行爲提出不同的理由。功能學派福利與工業化的假設認爲精英分子被迫需要填補由於傳統社會解離所產生的漏洞。馬克斯主義的解釋則提供了被動與主動觀點；政治精英分子建立方案的目的不外是對於勞工騷動所引起威脅的反應或是利用這些方案以爲有效達到社會控制及階級壓迫的工具。會社主義理論認爲政治精英分子引進福利服務以操縱有組織的團體及促進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的關係，而使得結構整合與均衡得以維持。

對於這些理論解釋的價值並沒有太多的爭辯，但是較多的注意集中在概念與方法的缺失，而忽視了實證效度的討論。極少有嘗試將這些理論作嚴謹的實證探究。因素分析的研究當然是實證的，但是對於觀察統計的相關卻沒有解釋。雖然馬克斯主義理論以歐洲及北美歷史資料爲主以提出它的論點，但是卻較少使用實證方法學的觀點，同時其所選擇的特例均可以被批評。社會主義理論

亦是選擇以歐洲及北美的歷史資料爲主而其限制。雖然 Mishra 指出功能學派理論經過實證的檢視後，可以發現工業決定主義的存在是一種「弱」形式的關係。但是（如同馬克斯主義的研究一樣）這個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工業國家的經驗，而忽視了亞非及中南美洲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實證領域。Jones 即指出，以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經驗來實證測試這個假設應是非常的適當，但是很可惜這種情形並未發生。

如同先前所指出的，四隻小老虎的例子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藉由測試社會政策發展的理論來擴展實證領域。這些國家當然無法構成一個有效測試研究所需的個案數，但是這些社會正在快速工業化，它們提供了一個很難有的機會來洞察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的福利動態層面。

二、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工業化

雖然在最近數十年，香港、韓國、新加坡與臺灣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然而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顯示的前景卻是黯淡的。香港與新加坡曾經是貨物集散中心，但是戰爭終止了它們傳統重商的追求及嚴重破壞了它們的制度體系。臺灣會爲美國轟炸所破壞，同時由於中共在一九四七年佔領中國大陸，而使得約一五〇萬國民政府人員撤離至此島，使得經濟承受更大的壓力。就香港而言，此時期有超過一〇〇萬以上的難民由大陸湧至，加速了這個殖民地嚴重的經濟問題。雖然韓國，身爲第三世界落後的國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未遭受嚴重損壞，但是一九五三年國家分裂所導致的衝突卻是破壞性的。所有已建立的工業均遭制破壞，同時有數百萬的農民遭到殺害或逃離家園，使得傳統農業經濟爲之衰退。如果一九五〇年代有經濟學家預測這些社會有今日經濟如蛻變，則將是非常令人驚訝的。事實上，當時多數的經濟學家認爲它們是沒有什麼遠景的。

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經濟學家均使用最高級來描述這四個國家的表現。

它們的成長率非常令人震驚，不僅是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標準，同時也是就工業國家的標準而言。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間，工業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的成長率是四%，然而臺灣平均是一〇%，香港為九·五%，韓國為九%，新加坡為八·五%。這些表現超過了日本的成長率，雖然日本的成長一度非常的快，同時超越西方國家工業化早期以及後期發展的經濟成長率。這四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與經濟成長率的增加是一致的，目前已成爲開發中國家的前茅。新加坡增加的紀錄即可爲明證：保守的估計這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由一九六〇年的四〇〇〇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三年（以一九七三年物價爲準）的一八三〇美元，而成爲開發中國家最富有的。在一九八〇年，新加坡的平均國民所得爲四、四〇〇美元，比希臘、葡萄牙與南斯拉夫高，僅比愛爾蘭略低。

所有這四個國家均經歷了相當程度的結構改變，亦即工業取代農業，或是貿易成爲主要的經濟部門。在韓國，農業所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間由三七%降至一六%，同時工業由二〇%增至四一%。此種農業與工業部門改變的情形，在臺灣亦是如此。一九七四年當新加坡第一次本國出口超過轉口時，貨物集散貿易已不再是該國主要的經濟部門。在香港，此方面的統計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公布，當時本國出口已超過了轉口。

這四個國家工業的擴張主要是由於快速努力密集的成長以及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在香港，此種工業化型式始於一九五〇年代紡織及塑膠產品第一次出口時。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製造部門多元化的趨向以生產各式不同的消費產品，包括衣服、電器及精密零件，照相機以及光學器材。在一九四七與一九五九年間，受僱於製造業的員工增加四倍，一九七一年時到達七五〇萬人或將近所有勞工的半數。在一九八〇年，五七%的勞動力受僱於工業，此比例比西方工業國家都高出甚多。在臺灣，進口替代是早期的工業策略，出口替代在一九六〇年代逐漸趨於重要，到了一九七五年就業部門的分配與其他工業國家情形大致相當。韓國與新加坡是起步較晚的，但是兩者的製造出口均擴張於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新加坡並自國外進口外國工人以解決本國勞力缺

乏的情形。在韓國，農業勞動人口的比例仍然是相當的高，但是製造業的擴張與勞動力成長的速度一致。雖然製造業仍然是以消費品爲主，但是重工業已經擴張。例如韓國一九七六年製造業佔了出口的八五%，其中化學及重工業產品即佔了三五%的比例。

在這四個國家工資就業 (Wage employment) 的擴張導致收入的增加。根據 Calenson 的計算，臺灣實際工資在一九五〇年代平均每年增加四%，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一九七〇年代爲五%。在韓國，實際工業所得在一九六八與一九七八年間平均增加一六五%，然而所有薪資所得亦增加一二二%；農村收入也顯著地增加。Goser 與 Geiser 也說明了香港及新加坡有相同增加的情形。

雖然當地居民無可否認的由快速經濟發展中受惠，但是勞工運用的措施卻遭受到負面的批評。縱然最仁慈的觀察家也必須承認這些國家的工資以西方標準而言是低的，同時工作時間是較長的以及安全的考慮是次要的。除了新加坡外，其餘國家就業的情況均未有良好的規範。這四個國家的工會不是受到嚴格的限制，就是無法發揮功效。這四個國家一個顯著的特徵是高的婦女就業率。新加坡製造業最擴張的時期，婦女就業增加了八·五倍，而男性就業僅增加了三倍。在臺灣，七八%的婦女勞動力在一九五三年時係從事農業，此種情況在一九六〇年代快速的改變，那時大量年輕、無技術的婦女進入製造業。在一九七六年，婦女佔工資就業的比例是三〇%，但是就製造業而言卻將近有五〇%。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另一個特徵是勞工工作於小企業的現象。它們通常是由家族經營，雖然重要性已逐漸消失，但是它們在工業發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香港與臺灣。香港在一九七六年將近一六、〇〇〇個小企業。臺灣在一九六一年，幾乎三分之二的製造業僱用員工少於三人；此比例在一九七六年雖降至一二%，但是這些小企業仍然是非常的重要，通常爲較大企業委託生產零件及半成品。

對於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快速工業化的解釋，包括單一解釋的歸因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勤勞與所謂儒教倫理的顯揚；或是美國爲防止共產主義所給與的大量

援助；或是由於歷史上原先有利的條件等。但是這些及其他因素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改變，卻無法解釋促進這些國家工業發展的其他事件；只有將個別因素與結構因素統合解釋的理論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在發展經濟學家的概念上，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是最常被提及，同時也顯示出能提供有效的觀點。所有這四個國家均經歷了快速的資本形成以及製造業提供了成長的動力。自由化貿易條件以及自由勞動市場同樣是相當的顯著。這些實證的觀察增強了現代化學派聲稱解決第三世界貧窮與低度發展在於沒有政府任何干預之下的資本主義體制。這是不足為奇的，香港已被新右派理論學家如Friedman等反覆引用以爲資本主義發展的模範，同時也爲市場功效的明證。

此種解釋的問題在於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並不是基於放任主義，反而是政府極度的干預以及有意採行促進工業化政策的結果。現代化理論學者會不贊同臺灣國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計畫體系(它產生了一系列如蘇聯型態的經濟計畫)、執行強而有力的土地改革及農業現代化方案與將重要工業國有化以及制定嚴格進口管制等行動。相對於促進自由市場，臺灣「創造了一種雙元經濟的型態，只有出口的製造可以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進行」。韓國政府所採行的是更強的干預主義，它不僅給予外國投資的誘因，同時操縱、審查及管理資本的流向，使得韓國今天成爲「世界上最嚴謹被管制的經濟，政府策動幾乎所有私人部門的投資，同時運用足夠的權力以保證這些投資的公司可獲利」。新加坡趨向工業化的動力也爲干預主義所左右，然較韓國與臺灣有彈性，然而政府仍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規範經濟行爲。在這四個國家之中，香港被認爲是較放任主義的，但是亦不能聲稱政府在經濟管制上未扮演任何角色。雖然在工業化初期由上海來的許多企業家所發揮的功能多於英國殖民政府的努力，但是歷年來政府卻持續地以不同的方法及措施來維護殖民地的成就。Tutelaar對於近來香港未來前途危機的回答中明顯的證明了此論點。

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經驗並不能支持現代化的理論。這些國家工業的發展

並非放任主義，而是爲干預主義所左右。發展的中心是會社主義及壟斷的資本主義，而非競爭的自由企業精神。政府經由決心及努力來控制經濟制度及追求工業發展政策。這是相當合理的假定在此種相當干預的氣氛下，政治精英分子對於社會政策的形成會與工業化及經濟發展的目標求一致。

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社會服務

四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政府在建立各種不同的社會方案與福利方案中確實扮演干預的角色。所有四個國家的政府均有提供教育、住宅、社會安全、衛生與社會工作服務，同時這些服務中有些佔了賦稅收入相當的比例。這些服務隨著社會服務科層組織的成長以及服務輸送過程中許多社會服務專家的參照而發展。

所有這四個國家均有相當大的正式教育方案，同時在每一個階段均由公共部門佔優勢。若以國際標準而言，這四個國家公共支出中，教育佔了相當大的部分，同時也均提供普及的基礎教育。成人識字率超過九〇%，可謂相當的高。然而在教育經費的分配方面，各國卻有顯著的差異。例如，韓國於一九七九年平均每人教育支出爲二十四美元，新加坡卻相等於一〇〇美元。在中等及高等教育就學率方面亦有顯著的差異，其中新加坡雖然在教育經費的分配上較高，但是在此兩方面的比例卻較其他的國家爲低。

如眾所熟知的，住宅在香港及新加坡是一個主要的社會服務項目。新加坡的住宅發展委員會(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在一九六〇年成立，實施許多建設方案，同時在一九七〇年將近有四〇%的人口是由公共部門提供住宅，在一九八〇年此數字更高達八〇%。幾乎所有的這些住宅均售予居住者。在香港，國民住宅建設也大量的實施，但是住宅標準卻較新加坡及歐洲國家爲低；同時仍有許多貧民窟存在著。在其他二個國家，公共住宅投資是較少的。Haesen和Reo指出韓國第四個發展計畫中包括了一個方案準備建立五〇萬戶

國民住宅，但是與需要而言，此比例仍是小的。在臺灣，臺北市政府的國宅管理處是最大的住宅機構，但是自一九六一年開始，只有九、〇〇〇戶在補助方案之下完成。

許多預防及治療的公共衛生方案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均是由政府來提供，但是在服務的運作方式以及經費方面，各國之間卻有顯著的差異。香港與新加坡有相當多的政府醫院及診所，除了低收入家庭外，醫療服務必須收取費用。私人醫療執業及設備近些年來在這二個國家均快速的成長以照顧中上收入的團體。臺灣及韓國也同樣的建立了完整的私人醫療服務。Gatenson 指出在臺灣大多數的醫生均係私人執業，而在公立醫院則屬兼差性質。韓國與臺灣的社會安全制度中均提供醫療保險方案給受僱者及工人。同時，韓國目前正在執行一個創新的方案以將範圍擴及至農民。香港與新加坡目前並沒有醫療保險方案。雖然這四個國家有不同的醫療照顧體系，但是人口健康狀況的指標如預期壽命與嬰兒死亡率卻與其他工業國家的水準是相當的，只有韓國較為落後。

所有這四個國家均建立了社會安全服務，但是同樣的它們之間亦有顯著的差異。在這四個國家中，臺灣具有最完整的社會安全方案以保險為基礎提供退休、殘廢、遺屬、疾病、生育、醫療與傷病給付。然而退休、殘廢與遺屬給付的方式卻是一次給付。韓國的保險方案並沒有包括退休、殘廢或死亡給付，只限於疾病、生育與職業傷害給付。比較上，香港與新加坡並不是運用社會保險的方式，而是依賴不同的措施來處理不同的意外事故，其中許多方案被社會安全專家認為是落伍的與不充足的。在這二個國家，雇主責任方案被用來提供職業傷害、疾病與生育給付，然而在新加坡，公積金制度 (provident fund) 被用來照顧退休之用。香港則已建立了對所有老年人均給與社會津貼的方案，在開發中國家而言是相當獨特的。

許多社會工作服務亦提供著。所有這四個國家均有社會工作學系，同時大多數的社會工作人員均在政府部門就業。在每一個國家，社會工作配合社會救助措施以幫助有孩童的低收入家庭、殘障者與老年人。雖然以西方及當地標準而

言，這些救助給付均非慷慨的，但是不同於其他開發中國家，這些方案均已相當完備，而成爲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福利體系的主要部分。在這些國家，許多收容老年人，殘障者與青年犯罪者的機構均由社會工作服務負責經營。志願社會工作服務均已相當完備的建立，同時受到政府主動的激勵與促進。

四、工業化、福利與社會政策的運用

前已論及西方社會政策發展的各種理論均有共同的信念，即強調工業化扮演決定性的影響以及政治精英分子，爲因應工業化所產生的影響，藉由建立與使用社會方案來達到預期的結果。對於這些理論比較實證的評估必須要直接探索到這些假設，同時方法上不僅是要集中注意到支持假設的那些事件上，也要動地地尋找可以反駁它們的證據，縱然對四小虎作一個粗略的回顧，也顯示出否定此假設的許多例子。

現代政府福利提供爲工業化過程整合功能的假設可以爲證據所推翻。雖然無可置疑的，亞洲四個新興工業國家的社會服務在最近二、三十年間，也就是這些社會經歷快速的工業化時期顯著的擴張，但卻不可以聲稱此種情形的發生僅侷限於工業發展的範疇內。例如，周永新曾經指出，社會安全措施在新加坡的建立始於英國統治時期，早在該國採取工業化政策前；事實上，該國於一九五三年創立的公積金制度要歸因於英國的殖民政策遠多於其他加工業化等因素的影響。一些以農業爲主導的英屬非洲、亞洲及加勒比北海等殖民地社會安全措施的建立亦係受到同樣的影響。有很多的證據顯示，許多第三世界農業經濟的國家在最近數十年間社會服務顯著的擴張，而這些促進擴張的原因乃是社會要求，國家主義與外在影響等與工業化並無相關的因素。

政治精英分子有意因應工業化的狀況而建立社會方案來實現特工目的假設，就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而言，似爲可能的解釋論點。這四個國家的政府均積極的促進工業發展，可能香港除外，在政治管理上均受到權威主義及會社主義型

態所影響。此外，亦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些政府會利用社會政策來促進勞工穩定，增進結構整合以及滿足社會需求。運用社會政策為明顯的政治工具在韓國及臺灣均相當的可能，由於當地政治精英分子為了防範共產主義的威脅。

但是，同樣的有證據否定此假設。許多社會政策的研究者認為這四個國家社會政策的發展是屬於漸進的及緩慢的型態。周永新回顧香港引進社會保險的建議，顯示殖民政府基於預算限制的因素而反對，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頒布社會福利白皮書時才稍有變化，但是政府的意向仍不明確，並「再一次延緩作決定」。香港實施普及式老年津貼的措施同樣是漸進的發展，開始時方案的涵蓋是有限的，一直到範圍逐漸的擴大。韓國政府對於老年年金保險的態度亦復如此。雖然建議實施此方案已歷經多年辯論，並於一九七四年制定了立法，但是迄今尚未實施。一九七九年，韓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短期內將實施此方案，但是一直未見行動。在臺灣，擁有最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但是卻很顯然的不願意以年金給付取代一次給付，雖然財務可以經由目前薪資扣稅的方式解決。

決策的漸進主義亦影響其他社會領域的提供，如住宅即是如此。大量國民住宅方案的發展可以視為達成工業化整合政策的部分。經由提供住宅給勞工，政府可以促進勞動力的穩定及整合。由於住宅改善會直接影響衛生水準，因此住宅投資可以增進勞動生產力。國宅的可及性可以緩和都市貧民挫折的經驗與減少可能的衝突。然而如同Drakakis-Smith指出，這些考慮並未使得香港政府在二九五〇年代開始大量興建國民住宅。這種對於遠建住宅及擁擠的忽視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九龍石硤尾遠建區發生大火，造成五萬人左右無家可歸時，政府方才採取行動。縱然到一九七三年，當政府最完整的住宅方案公布時，它的目標及措施仍反映出，一九五四年來政府國宅計畫有意忽視的情緒。亞洲四個新興工業國家中僅有二國（香港與新加坡）有廣泛的住宅方案，但是兩國均受到嚴重地理的限制以及財產價值過高的影響，顯示出它們在從事大量興建國宅的決定可能是受到空間及經濟因素的影響，而非工業化的力量。

亞洲四個新興工業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採漸進的型式與部分政治精英分子

明顯不願意擴大社會方案的心態是一致的。它們持續的肯定自由企業、自助以及勤勞工作等價值的信念，同時經常宣稱福利主義的弊端。雖然這個態度阻礙了社會政策的發展，同時促成了漸進的特性，但是並沒有阻止許多社會方案的興起。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政治精英分子有意利用社會政策限制社會方案的發展以提高外國投資、激勵工作誘因以及擴大利潤的論點是有解釋的價值，但是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這四個國家仍有相當廣泛的社會方案。這個問題可以由這四個國家的社會安全方案來說明。雖然這四個國家缺乏以保險為基礎的退休方案係由於考慮工作誘因、利潤以及外國投資，但是卻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這些國家建立了保險方案來涵蓋其他的意外事故或引進其他收入維持的方法，而這些卻可能被認為對於經濟發展有相同的反效果。

如果以方法學的虛無假設來驗證社會政策與工業化的理論對於亞洲四個新興工業國家的適用性，可以發現要支持這些假設相當的困難。這並不是要否認已發現的許多例子中社會政策被用來促進工業發展。例如，相當明顯的，臺灣政府的方案中，廣泛的建立嬰兒與幼童的日間照顧網絡與工業策略中相當依賴女性員工的參與是相符合的。同樣的，亞洲四個政府尋求促進職業與技術教育的擴大以增進勞動力的技能。雖然可以列舉出更多利用社會政策以促進工業化的例子，但是同樣的有許多例子在理論與方法上無法獲得證實。

本文實證評估的結果顯示，雖然已建立的社會福利與工業化的理論可說是相當完備及有明顯的說服力，但是卻不能解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福利現象的複雜性。這些國家社會政策等發展相關連的因素仍需進一步探討。一個完整的解釋可能不需要考慮政治、歷史、經濟、文化與國家的特性，甚至現實的因素也要指認，這些因素綜合的互動，促使了這些國家及其他正邁向工業化國家福利制度的興起。

* 本文譯自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3), 1986, pp. 225-238。原文作者 James Midgley 任教於美國路易士安那

大學，譯者為中興大學社會學系講師。